

科学与人文的划分,是在工业文明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才出现的事情。

玉渊杂谭>>>

## 毛笔字通知书,这个可以有

文·句艳华

近期,随着高考录取季的到来,陕西师大的毛笔字录取通知书引来一片叫好声。几位退休老教师端坐房中,手执毛笔缓缓而书的镜头,真是有如一股夏日清流。这样的大学名片,可以有。

设想即将入学的学子们,手持这样一份通知书,赏心悦目的同时,自能感受到其中绵长的寄望和嘱托,对未来的母校产生憧憬热爱,再甚或,还能对传统书法乃至书法产生出一些兴趣。真是一举可多得,小节有大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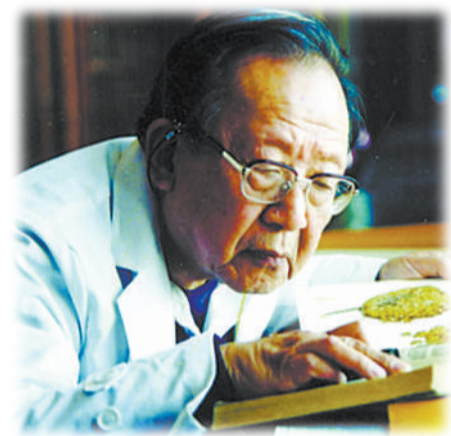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,由于时代的原因,书法只是在书界薪火相传,大部分“圈外人”握笔机会变得非常少。现在能写出漂亮字的,多数是中年以上的人,青年一代则寥寥,不少年轻人外形有型有款,一落笔却“武功”稀松,让“过来人”直叹美中不足。

只有汉字才将工具性的文字上升到抒情和艺术的高度,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。它一方面体现人的情感变化和审美情趣,另一方面,也可以让人的性情实现“转移”。民间常说“字如其人”,书论讲“书为心画”,其实道理一样,都是在说明书法和人内在精神的对应关系。所以习字向来为历代读书人所重,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提高文化修养,也在于修身养性。

人物纪事>>>

## 吴征镒之惑

文·刘光裕



7月20日,植物学先辈吴征镒离世一月整。耄耋之人,死本无所惧,只是怕自此之后无人识得草木,花草亦无友。

吴老97岁高龄也算高寿。我所关注的是,学界是否会借机好好思考中国植物学的现状和未来,推进植物文化。吴老前几年写下《九十自述》一文,回忆了自己投身植物学的一生,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植物的强烈情感。这里结合吴老的一些轶事,以及当下的植物学现状,可做一番剖析。

吴征镒儿时家中有个菜园,老墙荫处的小草叶下珠激发了他对植物的兴趣,此外,家里有本字画书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可翻阅查询,使他对植物的兴趣越发浓厚,并最终选择了清华生物系。考入清华后,师从李继侗,所用教材乃英文国际教材,内容却是香山、西山、大觉寺的内容,理论与国际接轨,内容贴近生活,深入浅出,生动活泼。清华生物系图书馆里,各类书材料也十分丰富。

吴征镒尚未毕业便参加了“西北考察团”,有机会出野外“万里巡行”,采标本,做卡片,以自然为师。虽是走马观花,但几乎跑遍了全中国,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。科研上,吴老有“海龟”竺可桢带队,对中国自然资源进行科考,机遇十分好。在云南蹲守之后,已小有成就,期间还受聘于云大,给学生上课。到了80岁方才写出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《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》。生逢乱世,实乃不易。

与其他一些植物学家(如胡先骕、蔡希陶)等相比,吴老重学术,轻运用。他说话温和,除学术著作之外,言论不多。然而,草木的重要性不止在于学术。于普通大众而言,植物如何开花结果、传宗接代,如何起源分布和适应进化意义并不大。其重要价值在于实际运用和心性培养。在古代,先哲鼓励读书人首先便要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,熟读《本草》,认识天地万物,通过认识草木,学习草药,锻炼读书人刚正不阿的意志。悟道草木医者的“仁心仁术”。这种朴素的博物精神,持续了几千年。

倘若梳理中国人对植物的态度与情感,现代植物学作用微乎其微。西学之前的植物学著作,如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、《救荒本草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植物名实图考》,作者均是出于实用主义的

角度,方才著书立说。中国古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与西方植物学相比,现代植物学更加深刻、系统,但西方的植物学发展是建立在西方博物学之上,辈分之间、学科分支之间环环相扣,少有断层。而中国自引入植物学之后,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但断层明显,植物运用和赏析极为落后,人才培养也显乏力。如今的中国很难界定植物学的地位。《九十自述》中吴老只回顾了自传故事,并未对学科现状和未来进行评价,真不知吴老在世时作何感想。

昔日的科学院,在竺可桢的带领下,完成了中国气候、地理、水文、土壤、植被、动物、海洋等各大自然地理调查,各模块均功勋卓著,成绩斐然。经过若干人的努力,植物学界完成了浩大的志书,虽然各章节水平参差不齐,但毕竟是完成了国家到省级别的植物志,基本摸清了家底。这些工作做完之后,中国植物学似乎没有什么明晰的道路。现代西方自然类学术的问题推进很快,且手段多元化,我们在后面猛追,中国植物学慢慢与生态学融为一体了。

另外,植物学的难点在于科普之难。老一辈志书描绘植物的格式都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抄袭,极为枯燥,不利于学习。而国内具有科普性质的地方化的彩色图鉴也远远不够。精美有趣的植物如果不能展现给世人,何谈造福人民,美化城市呢?植物学人应该多出生态图鉴,图鉴是学生入门最好的帮手。植物图鉴或图书对新手的作图无需用多言,植物图书馆建设便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

科林碎语>>>

成。静生生物所胡先骕所写《交心》中便对植物所植物图书收集不多表示极为不满,华南园陈焕镛1930年去英国开会还偷印邱园古版植物学书刊,几十年前的不满情绪,还有偷印的精神如今安在在乎?

其实,认植物好比认人,多接触自然就认识了,何需在意有几斤几两,几个手指呢?在兴趣培养方面,我们与西方思维相去甚远。在当今信息交流极为发达的社会,既有机遇也有挑战,我们还需深思科普教育之事,多培养后备人才,引导广大的植物爱好者,培养中国自己的植物文化。

最后的一重窘境是,我们虽然植物丰富,但运用不多。记得有人谈过吴老曾经的一个困惑。他曾经带几个日本人到某地考察发现一种新种,离开后日本人又返回去采样,将其发表。另外,还有英国人在云南大量有成效,难怪政府要丢掉以生态为主的大方针,另寻它法,重走重工路线。这也就怪不得昆明和云南政府要选择PX项目了。植物界中,如此种种困惑,作为领军人物的吴老,估计也是极为不解的吧。

对于学者而言,总有一些学术趣味是可以引人入胜的。据我所知,谢泳前几年还曾打算研究民国时期的英文词典,他曾收集了很多民国时期的英文词典,再加上他读书时念的还是英文系,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研究英文词典吧!他甚至还曾去考证方便是否起源于厦门。这些研究的趣味让人觉得颇有意思。

我在厦大读书三年,熟悉谢泳的学术兴趣。有时我猜想,谢泳是个没上过学的人,但他的学术兴趣却总是能由低到高,由俗向雅,根源在他对文史是真有兴趣。他早年从事当代文学评论,后来研究报告文学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他开始研究储安平(《观察》周刊,留意有欧美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,此后研究西南联大,趣味也是一向的欧美为上。我又知道谢泳近年着意搜集晚清民国文人的诗文集,已有相当数量。他这方面的趣味特别奇怪,比如日文诗文集,他要的是油印、线装、打字的不收,铅印的不收,洋装的也不收。我判断可能是他以为油印稀少,更具私人性质,接近雕版,更有手工痕迹吧。

大学教育,学术趣味极重要,对学生的影响,我以为超过具体的课程。当然,这本书的多数文章也还是侧重知识分子的研究,不过研究的年代则从民国延伸到了共和国时期。其实,研究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要比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难。如果去研究民国知识分子,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去故纸堆翻阅民国老杂志,而1949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鲜有同人杂志的存在空间,因此从史料来源上看,研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,很难从杂志入手,如果又看不到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的话,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研究,无异于盲人摸象。

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研究上,谢泳采用的史料多是当时的内部通讯与新华内参。这些当时被限制阅读的文章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好视角,因为就在这些内部参考资料上,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想法。书中,从谢泳钩沉的这些史料中,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对胡适批判态度的态度,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批判萧也牧的《我们夫妇之间》之前,早就有对作家刘盛亚(再生记)的批判,更有对胡风案的另类解读。

当然,不论是研究科学史,还是研究知识分子,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史料的积累问题。在这方面,谢泳遵循的是傅斯年和胡适的研究方法。傅斯年曾有名言:“史学便是史料学。一分材料出一分货,十分材料出十分货,没有材料便不出货。”与傅斯年相同,胡适学术研究的关键词是“拿证据来”,对此胡适的名言则是: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。基于此,胡适与傅斯年在找寻史料方面的共识就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材料”。

在找寻史料方面,谢泳可谓很用心,他为了研究1957年的学生右派,曾努力收集了全套的《红楼》杂志,这本书中《红楼》杂志里中所见林昭史料就是在看到整套《红楼》杂志之后所做的研究。

沁园春·雪  
赵荣生

北国风光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;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,看红装素裹,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,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;唐宗宋祖,稍逊风骚。一代天骄,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

尺度的冷高压。这种雷暴高压(积雨云中一般都有雷电)虽然个儿不大,但气压梯度并不小,雷暴大风由此从这里迅速向四周扩散,这就是雷阵雨天气的大风之源。在积雨云前进方向上,大风会很快超过积雨云前部雨区而先期到达。这又是雷阵雨天气“先风后雨”的原因所在(非前进方向上则有风而无雨)。

宋代曾巩的《西楼》,描写的正是这种雷雨大风天气:“海浪如云去却回,北风吹起数声雷。朱楼四面钩疏箔,卧看千山急雨来”。西(朱)楼位于海滨和内陆山区之间,诗人故意卷(钩)起帘幕,主要并非为了引人入胜,而是为了躺着也能欣赏“千山急雨”的壮丽景色。可见朱楼当时大体位于积雨云前进的路径之上。

但是,许浑诗中的“山雨欲来”,实际上可能并没有降临,即咸阳城西楼并不一定在积雨云的前进方向上。因为诗第五、六句“鸟下绿芜秦苑夕,蝉鸣黄叶汉宫秋”,是何等的悠闲(周汝昌语)。实际上,诗人此句主要是寓意唐朝即将崩溃(因为诗的末两句是“行人莫问当年事,故国东来渭水流”)。“风已满楼”,“山雨欲来”,气氛已足,寓意已寄。至于到底山雨最后来与没来,对全诗实际上已经并不重要。

1988年6月,我到赤道附近的吉隆坡市开会7天,外出时也遇上多次雷雨天气。可是发现那

里的赤道雷雨天气虽几乎天天都有,但大风却并不大,持续时间也短;雨滴在皮肤上,竟是温乎乎的。

原来,这是因为赤道滨海地区空气十分潮湿,积雨云后部夹卷进来的空气也不干燥,因而积雨云后部下降的雨滴蒸发也慢,雨滴和周围下降气流温度偏高的结果,地面上形成的中小尺度高压就不高,雷暴大风自然就不大、不持久了;掉到身上的雨滴自然也是温乎乎的了。要知道,我国北方夏季雷雨大风之凉,雷雨雨滴之冷,体弱者被淋湿了,一般将难逃感冒。

沁园春·雪  
赵荣生

沁园春·雪  
赵荣生

图话>>>

图话>>>



真水 绘

在野外,人们常说,如果看到几棵古树,那估计有寺院,如果看到一片古树,那可能有陵墓。寺庙园林是中国园林的一个重要分支,而古树则是园林里的精华,既有精神寄托,也有美化环境达到建造禅林的效果。因为信仰的作用,如今很多古树也只能寺庙里看得到,它们历经千年仍充满智慧地看着凡人。

乐享悦读>>>

文·林建刚

## 学术趣味与史料积累——读谢泳新著

对于谢泳的学术研究,多数人都知道他是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。学界熟悉他,主要是因为他通过一个人(储安平)、一本杂志(《观察》)、一所大学(西南联大)所展开的知识分子研究。

其实,谢泳看书极杂。可能是青年时代爱读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的缘故,谢泳对科学史也很有兴趣,《思想利器——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》的前面几篇就是这样的研究。他研究“相对论”在中国的传播,论述“Condom(避孕套)”在中国的传播史,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研究。

对于学者而言,总有一些学术趣味是可以引人入胜的。据我所知,谢泳前几年还曾打算研究民国时期的英文词典,他曾收集了很多民国时期的英文词典,再加上他读书时念的还是英文系,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研究英文词典吧!他甚至还曾去考证方便是否起源于厦门。这些研究的趣味让人觉得颇有意思。

我在厦大读书三年,熟悉谢泳的学术兴趣。有时我猜想,谢泳是个没上过学的人,但他的学术兴趣却总是能由低到高,由俗向雅,根源在他对文史是真有兴趣。他早年从事当代文学评论,后来研究报告文学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他开始研究储安平(《观察》周刊,留意有欧美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,此后研究西南联大,趣味也是一向的欧美为上。我又知道谢泳近年着意搜集晚清民国文人的诗文集,已有相当数量。他这方面的趣味特别奇怪,比如日文诗文集,他要的是油印、线装、打字的不收,铅印的不收,洋装的也不收。我判断可能是他以为油印稀少,更具私人性质,接近雕版,更有手工痕迹吧。

大学教育,学术趣味极重要,对学生的影响,我以为超过具体的课程。当然,这本书的多数文章也还是侧重知识分子的研究,不过研究的年代则从民国延伸到了共和国时期。其实,研究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要比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难。如果去研究民国知识分子,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去故纸堆翻阅民国老杂志,而1949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鲜有同人杂志的存在空间,因此从史料来源上看,研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,很难从杂志入手,如果又看不到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的话,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研究,无异于盲人摸象。

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研究上,谢泳采用的史料多是当时的内部通讯与新华内参。这些当时被限制阅读的文章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好视角,因为就在这些内部参考资料上,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想法。书中,从谢泳钩沉的这些史料中,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对胡适批判态度的态度,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批判萧也牧的《我们夫妇之间》之前,早就有对作家刘盛亚(再生记)的批判,更有对胡风案的另类解读。

当然,不论是研究科学史,还是研究知识分子,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史料的积累问题。在这方面,谢泳遵循的是傅斯年和胡适的研究方法。傅斯年曾有名言:“史学便是史料学。一分材料出一分货,十分材料出十分货,没有材料便不出货。”与傅斯年相同,胡适学术研究的关键词是“拿证据来”,对此胡适的名言则是: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。基于此,胡适与傅斯年在找寻史料方面的共识就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材料”。

在找寻史料方面,谢泳可谓很用心,他为了研究1957年的学生右派,曾努力收集了全套的《红楼》杂志,这本书中《红楼》杂志里中所见林昭史料就是在看到整套《红楼》杂志之后所做的研究。

沁园春·雪  
赵荣生

沁园春·雪  
赵荣生